

體育文化的話語分析

——以《體育頌》文本為例*

郭遠兵 漆昌柱

[提要] 話語分析投注於體育文化研究，能夠有效地使體育文化研究擺脫審美疲勞的倦怠感。本文介紹了話語和話語分析的基本要點，將話語分析引入體育文化研究；接著，批判和破除了國內幾項體育文化話語分析研究的不當之處；最後，以《體育頌》文本為例，採用批判話語分析和積極話語分析對該文本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話語分析為體育文化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立場和方法，話語分析對體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激發價值。

[關鍵詞] 體育文化 文本 話語分析 批判話語分析 積極話語分析

[中圖分類號] G8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4 - 0144 - 08

引言

在文化研究早已興盛了近百年之久的現如今，再次提及體育文化的問題，似乎不可避免的會引起一種近似於審美疲勞的倦怠感。^①導致該局面的原因之一是體育文化研究長期困局於一些低層次理論框架內，做無謂和空泛的論述。本以為可以借勢文化轉向為體育學研究帶來激發價值，未曾料到的是研究積累日趨豐富，實質卻愈發貧乏。解決該困境的主要思路之一，是要超越低質的理論糾結，認清該主題的研究求異需求遠超求同需求。未來研究要大膽革新研究立場和思路，突破學科藩籬，勇於開創體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②

話語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是由 Harris 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經由 Van Dijk、Schiffrin 和 Potter 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在六十年代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近年來，話語分析的觸角已經廣泛地延伸到社會學、文學和心理學領域。它已經從一個邊緣和由少數學者討論的話題，轉變成各類期刊雜誌和學術討論的常客。^③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主要處於一個翻譯和引入階段，開展實質性研究時間很短。另外，話語研究投注不同學科的程

* 本文係2016年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項目號：2016M591581）及武漢體育學院運動心理學招標課題（項目號：2014YX07）的階段性成果。

度有很大差異。之於體育科學，現存只有寥寥幾項採用話語分析立場的研究，且立場和程序尚大有爭議。

鑒於體育文化外延的寬泛性，擬以《體育頌》為例作為話語分析的文本，用一種不同於傳統社會科學研究範式的立場和思維研究體育文化，作為對體育文化做求異研究的嘗試。此外，考慮到話語分析在體育科學領域的研究現狀，並為了強調話語分析研究立場的特異性，有必要對國內幾項關於體育文化所做的話語分析研究做些許批判。概言之，本文一方面試圖破除體育文化領域中話語分析不當之處，同時以《體育頌》舉例對體育文化做話語分析。一破一立，如履薄冰，權且作為話語分析投注體育科學研究的引玉之磚。

一、什麼是“話語”和“話語分析”

不同研究者對“話語”有不同理解。這取決於研究者所承襲的特定理論傳統，而這些理論又與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密切相關。楊莉萍將這些紛繁的定義大致分成兩類：（1）描述性定義。話語是建構某對象的意義、表徵或陳述系統。例如，Burr 認為話語指涉一套意義、表徵、故事或陳述系統。它們以某種方式共同生成對事物的特定看法。^④由這一定義引申出一類話語分析，“鑒於人類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不能免除意義，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文本性。‘生活作為文本’成為話語分析的一個基礎隱喻。”^⑤（2）功能性定義。話語即做事^⑥；話語即行動^⑦；話語即實踐^⑧。話語不再視為一種語言使用形式，而將它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互動和交往事件。^⑨該取向將話語分析置於社會的整體框架內，在“人—社會—話語”所構成的動態循環系統中考察話語的運作。按照黑格爾的“正反合”邏輯，還有觀點認為話語既是一種表現形式，也是一種行為形式。^⑩

對“話語”和“話語分析”的界定關係到話語分析的研究立場。因為話語分析首先是一種研究立場。^⑪話語研究有兩個主要立場：非批判性和批判性。非批判性立場是對陳述過程和功能進行研究，以 Potter 和 Wetherell 為代表，他們關注具體話語的文本意義和過程。例如，話語認知分析注重話語生成與理解，強調認知在思維過程和呈現中的作用。批判話語分析則關心諸如自我、社會更替和權力利害等現實問題，典型代表有福柯和 Van Dijk。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就是追究話語是如何被建構、被維持以及話語背後的權力關係。Van Dijk 則研究文本的整體格局，以及這種格局與意識形態和權力的關係。無論是批判性立場還是非批判性立場，從本體論角度，話語分析的重要意義在於消除實證主義、古典詮釋學和傳統批判理論為代表的實在論分析模式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影響。^⑫

不同話語分析立場，採用的研究程序差異很大。即便是同一立場，理論框架不同，研究程序也有差異。若採用 Halliday 的系統功能話語分析，則分別按照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三個程序進行。若採用 Fairclough 的社會文化分析法，則從文本分析、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層層遞進分析^⑬；多元話語分析則創新性地將後現代多元價值論與話語分析相結合，分析約束和引導話語的對象描述規則、陳述規則、修飾規則和主體構成規則^⑭。諸多方法和程序都是為了分析已經說出來的“話”是以怎樣的方式及按照怎樣的規則被生產、被傳播和再生產的。話語分析要和語言學相區別。語言學就是要研究詞法和語法。話語分析是要研究已經說出來的話，探討它們為什麼被說出來，為什麼以這種方式說出來。^⑮簡言之，話語分析是回答和理解支配著“已經被說出來的話”的方式和“被說出來的規則”是什麼。^⑯

二、話語分析投注體育文化研究的現狀與批判

當代社會科學發展中最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影響最深遠的趨勢之一，是語言問題受到越來越多學科的重視並成為時下眾多研究領域的主要論題之一。然而國內體育學界涉及話語分析研究的歷史不足 10 年，以關鍵詞“話語”和“話語分析”搜索到到體育類期刊文章僅 10 多篇，其中刊載在體育類核心雜誌上並且明確標注採用了話語分析的僅有 4 篇。為澄清話語分析投注體育學研究的立場和程序要點所在，現就這些研究做簡要評判。強調的是，學術爭辯本身就是學術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批判不是否定，而是建設，是科學最寶貴的精神。^⑩這些研究大致存在下列問題：

(1) 對話語形式和載體的理解不夠透徹；(2) 並沒有完全理解話語分析的目的；(3) 提及使用話語分析，卻未涉及經過話語分析立場和研究程序；(4) 沒有明確說明使用了哪種話語理論和缺乏相應的程序。簡言之，話語分析投注體育學研究還處於濫觴階段，研究數量寥寥，水平有待提高。

不過，話語分析的立場和話語體系開始在體育科學研究中滋長，一些文獻儘管並沒有採用話語分析的程序和方法，但是開始汲取話語分析的一些基礎理論，尤其是批判話語系統。例如，張世威和宋成剛的《社會排斥與農民工體育話語權的缺失》、劉永的《身體敘事文本—權力話語視域下的女性體育》，等等。^⑪作為一種新的研究立場和方式，與傳統的研究立場與方法不同，話語分析不僅是對後者的修正和補充，也對體育學和體育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重構體育學研究目的，體育學研究不再局限於揭示體育內在不變的規律，並將其抽象為一套概念、模型或表達式，話語分析者認為體育的本質是外界灌注的，是社會話語建構而成；其次，重構體育學研究的重點，體育學不再過分強調精確性，而是探討主體間性；再次，重構體育學的研究對象，體育學不再執著於體育穩定的狀態和結構，而是尋求承載體育相關意義的文本。

另外，話語分析對體育學研究的後現代轉向、本土契合性實現和緩解方法學困境都具有重要意義。儘管如此，體育學研究領域的話語分析研究明顯不足，這與話語分析在社會學、文學、心理學等領域方興未艾形成鮮明對比。因此，一方面，學界有必要擴大涉獵該研究範式和立場。作為後發進入該領域的學科，補足短板的同時也可能尋求到後發優勢，例如對體育經典文本做系統分析，避免各自為政和重複研究。嫁接話語分析的不同框架，根據具體研究的問題對研究理論和程序進行改適調節。另一方面，和其他範疇一樣，體育也是多元存在。體育可以是話語和文本存在，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存在；但是，話語不是體育文化的唯一存在。在體育學內開展話語分析的同時，也要注意話語研究自身的局限，例如“社會唯名論”、決定論和簡單還原論。研究者還要警惕陷入“用語言來解釋語言”的循環論證陷阱以及避免遭致社會相對主義思維的劫掠。

三、《體育頌》的批判話語分析

在體育文化話語系統中，《體育頌》是一首謳歌體育的不朽詩篇，也是被體育界高度認同的文本之一。批判話語分析旨在分析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係，揭示語篇如何源於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又如何發生反作用。近來最具影響力的四個模型是：Fowler 的批評語言學、Fairclough 的話語文化分析法、Van Dijk 的話語認知分析法及 Wodak 的語篇—歷史法。這四個模型對語境的理解和語料的選擇各不相同，但是都從 Halliday 的系統功能語法為基礎發展起來。^⑫

鑒於研究文本的特點，本文擬採用 Fairclough 的話語文化分析法，細讀部分詩句的形式和內

容，解讀其主體話語建構特點，體察文本如何構建社會現實和參與並促進體育世界變遷，挖掘背後蘊藏的政治和文化誘因，從而達到揭示文本反映和反作用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的目的。分析過程按照 Fairclough 的“話語三維概念”模式，從文本分析、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三個維度具體展開。

（一）文本分析

文本特徵顯示語篇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成為解釋其意義的線索。《體育頌》原文是顧拜旦於 1912 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辦的第 5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用一個法國名字和一個德國名字—霍羅德和艾歇巴赫發表的散文詩。散文詩是一種現代文體，是適應現當代社會人們敏感多思等心理特徵而發展起來的，便於誦讀和傳播。該散文詩採取直抒胸臆的紀實性（直抒式）結構，採用了抒情體和敘述體兩種文體。文本分析可以採用 Halliday 的系統功能語法程序，主要用及物性和情態系統做文本分析。

Halliday 認為話語體現於概念功能，概念功能又體現於及物性。及物性是指小句對經驗功能的再現，其作用是把人們在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見聞和作為區分成若干過程，具體包括物質過程、心理過程和關係過程等六個過程；分析涉及每個小句，過程頗為瑣碎。分析語篇的及物性可以推知話語相關方面的關係，即誰佔主導地位的問題。^②其中，文本反復使用關係過程，例如各種對體育的判斷“體育是……”等，使文本直接回歸到語境。言說過程，例如“以此達到”“可使”等，表達了語篇的教育目的和維護信仰的角力意識。

情態系統用於表達人際關係和影響他人意識形態的語言手段，主要通過情態意義和取向系統來展開分析。情態意義是指話語發起人對文本所講命題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斷，或在命令中要求對方或者自我承擔的義務。文本中使用了 8 處“就是”，“就”在語用意義上屬於重述動詞，表達了明確的情態意義。取向系統表達情態意義的主觀或者客觀程度，文本中在情態意義基本上以客觀定位為主，傳達話語發起人對體育的敬畏、對體育功能的肯定和對踐踏奧運倫理的堅決抵制。

（二）話語實踐

話語實踐是文本與社會實踐的中間步驟，將話語與話語參與者相聯繫，分析話語參與者在話語生成和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具體包括話語生產、分配和消費。話語所涉及的主要參與者是顧拜旦、奧林匹克的維護者和敗壞者。在話語生成過程中，顧拜旦扮演了多個角色：奧林匹克發起人和教育者、國際奧委會主席以及向敗壞奧林匹克精神的沙文主義勢力的警告者和挑戰者。顧拜旦利用制度內身份和奧運精神捍衛者的雙重角色，有助於文本的生產和分配。

作為奧林匹克發起人，他對奧林匹克有一種宗教情結：“……天神的歡娛，生命的動力！你猝然降臨在灰濛濛的林間空地……”作為奧林匹克的領導者和教育者，他負責宣傳和釐清體育是什麼：“體育就是美麗、正義、勇氣……”作為挑戰者，對於敗壞奧林匹克精神的勢力，他嚴正警告：“被可恥的慾望引向墮落”“任何人不可超過速度一分一秒，逾越高度一分一厘”；“我們所說的勇氣，不是冒險家押上全部賭注似的蠻幹”；“有人耍弄見不得人的詭計，以此達到欺騙同伴的目的。有朝一日被人識破，就會落得名聲掃地”。

話語的生成和分配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儘量有效地抵達受話者，讓更多受話者消費。為此，還要分析話語的言語策略和特定話語類型。該文本大致使用了宗教話語策略、科學話語系統和浪漫話語系統。當然，話語消費環節還涉及到解碼，受話者並不是消極被動的解讀信息，可能採取主

導型解讀、協商性解讀和對抗性解讀等方式。這些暫且無從分析。不過，話語行動者在多角色間轉換，採用相應的言語策略，很好地實現了交際意圖，不僅完成了預期的話語目的，話語文本還成為世人傳唱的經典。

（三）社會實踐

社會實踐是 Fairclough 話語文化分析法的關鍵，將話語與社會語境聯繫起來，將話語與社會意識形態和控制關聯起來。Fairclough 認為話語的社會實踐體現在話語對社會本身、知識和信仰系統的三種建構效果。^⑩這與布林迪厄提出的“場域”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場域是一個獨立的小世界，有著自身的法則，但同時又為它在整個世界所處的位置所限制，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牽制和推動。

話語分析的社會實踐，實質是從關係的角度考量話語與社會結構或者社會關係之間的互動。文本的創作背景是當時奧林匹克運動在西方世界被蒙上一層陰影。面對早在 1894 年就被寫進《奧林匹克憲章》且一再被闡釋卻又反復被踐踏的奧林匹克精神，顧拜旦採用散文詩形式並以一個法國名字和一個德國名字署名發表《體育頌》。顧拜旦以詩性的語言發出吶喊：即使是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宿仇國，也能在奧林匹克中增進瞭解和友好相處。該散文詩由此具備了反映和反作用的手段和資源。

體育與政治永遠分不開。但是，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使得奧林匹克成了政治角力的工具。體育與經濟也分不開；但是，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很多運動員人格淪喪。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奧林匹克的意義和價值被扭曲和異化。《體育頌》在向體育致敬和獻禮的同時，也是向異化奧林匹克的勢力開戰；它是體育的讚歌，也是討伐踐踏奧運倫理勢力的檄文。總之，《體育頌》正是在這一特定社會語境中，在奧林匹克蒙塵之際發生，多重交際力量推動著這一話語文本的發展和流傳。

四、《體育頌》的積極話語分析

積極話語分析由 Martin 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提出，晚於批判話語分析。批判話語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想反抗，積極話語分析關注人們如何團結和使人尋求生存空間，引導積極地改善社會生活。^⑪前者意在解構；後者旨在建構。國內關於話語分析論文中存在一個共同現象：找到合適的語篇後，根據其內容，或單做批評話語分析，或單做積極話語分析。其實，同一語篇，有的內容需要做批判話語分析，有的內容需要做積極話語分析。^⑫例如，Martin 就對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做了兩方面的話語分析。

《體育頌》的批判話語反映了當時“逾越”“冒險”“蠻幹”“欺騙”和“耍弄”的行為和社會意識，警告和干預了該行為和社會意識必將“內心受到絞縊”和“名聲掃地”。使之成為流傳經典的除了這種解構力，還有它所建構的完美體育景象，這就需要引入積極話語分析。批評話語分析揭露了奧林匹克背後的權力失衡；積極話語分析則關注經過鬥爭來重新分配權力，達到權力平衡和有序讓步。積極話語分析主要在評價理論框架下進行，具體程序包括態度、介入和級差三個步驟。^⑬

（一）態度

態度指心理受到影響後對人類行為、文本（過程）以及現象作出的判斷和鑑賞。說話人用它來做判斷，把情緒、情感反應、參加者和過程聯繫起來。態度系統可以進一步細分成裁決、情感

和鑑賞三個子系統。情感是整個態度系統的中心，它導出裁決和鑑賞系統。情感系統涉及情感表達的評價；裁決系統是關於人物性格的判斷；鑑賞系統事關事物價值評估。根據評價意義不同，態度分為肯定和否定。態度系統是整個積極話語評價系統的核心，而情感又是整個態度系統的核心。^②

“體育，天神的歡娛，生命的動力”，語篇對體育持宗教情感。體育是信仰，這是語篇的情感主線。“就”是美麗、正義……不僅表達了裁決態度，而且表達出堅定的態度。語篇還為該裁決給出了解釋。體育就是樂趣，是因為“……血液循環加劇，思路更加開闊……”裁決違反體育鑑賞的標準是倫理學：“高尚還是卑鄙，要看它是被可恥的慾望引向墮落，還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勇氣不是冒險家壓下全部賭注的蠻幹，而是經過慎重的深思熟慮”。作肯定態度時，立場堅定；作否定態度時，有理有據。

除去對體育持宗教信仰般的情感，語篇還有一種指向未來的情感。那就是期許感：“運動員得到啟迪，後代茁壯成長，青年學會尊重，各民族公平競賽”。這點顯著體現了積極話語分析對批判話語分析的補充功能，即通過積極話語指引社會和諧和權力平衡。

（二）介入

介入是用來考察態度來源和說話人對所說話語的確定程度以及願意承擔多大責任。通過介入系統可以分析說話人涉及了哪些聲音。自言是純粹的陳述，直言不諱地表明說話人的立場，直接介入對話語內容負責。借言則在命題或建議中包含著其他聲音。梳理整個詩句，話語作者首先憑藉宗教話語，將體育付諸於信仰權威。宗教信仰權威下，作者“任性”自言，做出了8次“就是……”開頭的斷言。之後，又借言科學話語，例如“體力”“肌肉”“血液循環”“組織”等，佐證對體育的裁決和傳遞理性的聲音和態度。

介入手段還可以通過話語擴展與緊縮來實現。對話擴展指發話人在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時容納或接受對話人同樣的表達。對話緊縮則是指發話人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時否定或拒絕對話人的立場和態度，剝奪對話人的話語空間。在對話擴展手段上，文本採用宣告手段向世人展示體育的功能，例如，“就是”和“是……還是……”等；用同意手段表達體育對未來的意義，例如“要求”和“告訴”，等；用高情態語詞抒發對體育真摯的感情，例如“激動”和“歡喜”等。在話語緊縮手段上，文本採用否定和反對手段鞭撻和警告那些投機和踐踏奧林匹克運動的話語勢力，例如“但是”和“不是”等。

（三）級差

級差是一系列價值，不局限於任何一個次領域，而是跨越整個評價系統，包含態度系統和介入系統，是用來表述態度和介入強弱等級的系統。級差系統通過語勢子系統和聚焦子系統實現具體運作。語勢系統指的是對態度和介入程度量和質的描述，分為強勢和弱勢。語篇中各種表示程度的詞彙、比較級和程度副詞通常與語勢有關。聚焦系統是對本質上不能分級的範疇進行極化，包括經驗範疇的銳化和柔化。級差關乎文本態度和介入的實現程度，因此被廣泛使用。^③

該文本是散文詩，級差使用頗為普遍。例如，反復出現的“就是”，就是質化型級差，用來表達對體育實在不容置疑的裁決態度。還有表達量化型級差的“一分一秒”、“一分一厘”、“全部”、“毫無”、“更加”等30多處。在體育的發生問題上，“猝然”降臨林間空地。“猝然”是銳化級差，表達了體育發生的神秘，是上帝恩賜給人類的驚喜。文本的柔化級差也用得很巧妙。例如，“若不為此，肌肉發達有何用？”等語句中“何”字的使用，貌似柔化質疑，答案卻不容

辯駁。

級差使用過於普遍，不再一一說明。綜合態度、介入和級差系統，不難發現三者精巧結合，共同完成對文本的評價。評價理論是一個富有張力的理論體系。通過評價理論，文本建構起發話人與對話人之間的相互交流的關係。^②在對社會意識和權力的分配和平衡的解讀上，積極話語分析比批判話語分析更加柔和，收藏起鋒芒，讓人更能接受和看到希望。僅僅滿足於揭露和批判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還要有積極友好的態度，朝著“和平語言學”的遠大目標努力，最終才能建成一個寬鬆、和諧和共處的人類社會。^③

五、結語

在體育學界，體育文化研究可劃到宏大敘事範疇。拋棄空泛理論糾纏，是體育文化研究打開局面的必經之路。^④採用實證化路線，找尋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的體育文化。採用現象詮釋思維，體育文化會呈現一個被人賦予意義的主觀實在。而話語分析，既不以客觀實在為主旨，也不向主觀實在靠攏，它呈現的是語言轉向下體育文化研究的新範式：體育文化作何言說，為何如此言說，言說效果如何。套用 McCarthy 和 Carter 的話：人們一旦開始從話語的角度來觀察體育文化，那麼整個思想觀念都將發生永久的變化。

儘管如此，話語分析投注體育學的成熟度遠遠不夠。面對話語分析在體育學研究的濫觴，相關研究者首先要學習話語分析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再謹慎過渡到實際應用。其次，體育文化是宏大的，不是某一個文本就能言說體育文化的全部內容。因此，還需要發掘更多適宜的文本來表達體育文化。另外，當下的話語分析大多選取自西方文本，中國人說話辦事有中國人的話語特徵。從話語權的角度，回歸民族體育文化話語研究，有利於通過話語來爭取獲得東西方體育文化話語權的平衡。

範式變更的趨勢不容逆轉，前景值得期待，但是轉變道路不是簡單突變的，而是漸進複雜的。在各學科領域，話語分析與其他範式混雜共存並相互競爭。在體育學界，話語分析研究的話語權更加勢微。但是，後現代和語言轉向的鐘聲已然敲響，繼續以傳統範式的理念與標準來評判話語分析研究，顯然不合時宜。^⑤話語分析研究需要學界小心培育，因為它會為體育學研究帶來意想不到的激發價值。當然，話語分析研究解決不了體育文化研究道路上所有的問題。體育文化更寬廣的知識和風景，要用更高的姿態和多元的眼光去領略。

①楊韻、鄒玉玲：《泛體育文化研究的哲學批判》，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②⑨郭遠兵、漆昌柱：《體育文化心理結構的理論初探：可能及限度》，浙江寧波：《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3年第5期。

③孫豐果：《話語分析整合研究》，山東聊城：《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④ V. Bur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46, 48, 51, 63, 162.

⑤ J. Potter, M. Wetherell, R. Gill, et al., *Discourse: noun*,

verb or social practic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990, 3 (2), pp. 205-207.

⑥ K. J. Gergen,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1999, pp. 62-90.

⑦諾曼·費爾克拉夫：《話語與社會變遷》，殷曉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12～30頁。

⑧紀玉華：《批評性話語分析：理論與方法》，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⑨吉 (J. Gee)：《話語分析入門：理論與方法》，楊信彰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年，

第 11 頁。

- ⑩楊莉萍：《心理學中話語分析的立場與方法心理》，北京：《心理科學進展》，2007 年第 3 期。
- ⑪薛燦燦、葉浩生：《話語分析與心理學研究的對話探析》，南昌：《心理學探新》，2011 年第 4 期。
- ⑫⑭謝立中：《多元話語分析：社會分析模式的新嘗試》，上海：《社會》，2010 年第 2 期。
- ⑬成曉光：《作為研究方法的話語分析》，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2006 年第 2 期。
- ⑮王福祥：《話語語言學的興起與發展》，遼寧大連：《外語與外語教學》，1994 年第 4 期。
- ⑯謝立中：《多元話語分析：社會分析模式的新嘗試》，上海：《社會》，2010 年第 2 期；M. Foucault, A. Sheridan,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75-185.
- ⑰郭遠兵、漆昌柱：《澄清前提，劃定界線——運動心理學研究預設之批判》，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4 年第 7 期。
- ⑱張世威、宋成剛：《社會排斥與農民工體育話語權的缺失》，天津：《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8 年第 2 期；劉永：《身體敘事文本—權力話語視域下的女性體育》，石家莊：《河北體育學院學報》，2015 年第 3 期。
- ⑲紀衛寧：《話語分析——批判學派的多維視角評析》，哈爾濱：《外語學刊》，2008 年第 6 期。
- ⑳ K. Halliday,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pp. 236-258.
- ㉑ 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 63-64.

- ㉒ ㉓ R. Martin,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The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006, 3 (4), pp. 31-35.
- ㉔胡壯麟：《積極話語分析和批評話語分析的互補性》，上海：《當代外語研究》，2012 年第 7 期。
- ㉕ R. Martin & P.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5, pp. 13-21.
- ㉖王振華：《評價系統及其運作——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新發展》，上海：《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01 年第 6 期。
- ㉗劉世生、劉立華：《評價研究視角下的話語分析》，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2 期。
- ㉘李戰子：《評價理論：在話語分析中的應用和問題》，南京：《外語研究》，2004 年第 5 期。
- ㉙許力生：《話語分析面面觀——反思對批評話語分析的批評》，杭州：《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

作者簡介：郭遠兵，復旦大學社會學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研究人員，講師。上海 200433；漆昌柱，武漢體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 430079

[責任編輯 陳志雄]